

新制度主义视角下的中西文明演进模式比较

萧 功 秦

〈上海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新制度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理解欧洲文明中如何发展出资本主义生产力，具有独特贡献。新制度主义特别注意一种制度，是如何在适应环境过程中，通过试错方式而演进的。本文通过欧洲与中国文明演进方式的比较，来说明不同结构对于一个社会的宏观演化的作用。

欧洲多样性的地理环境中，存在着分散的、自主的、异质共同体与个体。每个共同体或个体在适应自身环境变化的过程中，都能自由运用自己的资源条件与心智力量，来争取更好的存活与发展机会，这样，就出现不同的微观试错方向、路径与选择过程。其中有些共同体在试错过程中，形成了具有良好的效能与竞争力的经济制度，能够更有利于吸引人材向该地区流动，个体的这种“用脚投票”权利，反过来使其他独立共同体纷纷效仿，形成示范效应，促使一种先进制度广泛普遍于其他地区，失效的制度被越来越多的人或国家抛弃。最后，当新制度的接受者达到临界多数以后，整个欧洲就逐渐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发展。

当我们用这种制度生成的过程来考察欧洲国家的制度演化进程，可以发现，欧洲文明的演化能力就在于其结构的多元性、小规模性、自主性、竞争性与边界开放性（使跨政区流动得以可能）。这些因素的结合，有利于微观个体之间、共同体之间、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有利于形成一种演化机制。这种结构使微观个体的竞争与试错中形成的良知，可以通过自主的仿效而普及到更多广泛的地区。西方的制度文明是在复杂的反复、无止境的试错过程中，在不确定的各种因素的交互影响中，通过漫长的岁月而演化过来的。每一种制度都是针对处理某

种困难处境设计出来的办法，每一种办法都面对着被淘汰的可能，人们在尝试种种办法过程中，终于找到了所有办法中最具适应环境挑战能力的办法，即制度成本相对较低，收益相当较大，风险相对较低的办法。于是这样的办法就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于是形成约定俗成的制度。

那么中国文明的情况如何？古代华夏先民的生活区域，在地理上有利于农耕经济的同质性，使散布于中原与长江流域的、经济生活方式上同质的分散部落，在互动竞争中，通过松散的战争同盟，进而发展为分封制下的诸侯国家。这些国家在文化上基本仍然是同质的，它们彼此之间虽然与欧洲各国一样彼此竞争，但争夺的结果，不是走向契约制度下的平衡妥协，而是通过兼并战争而走向秦汉大一统专制帝国。郡县制帝国又运用国家政治权威，进一步同化各地区，通过书同文，车同轨，使文化上的同质性进一步增强，终于形成大一统的同质板块结构。华夏共同体是通过这种方式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的。

这一郡县制帝国文化的优势在于，它有助于自上而下地进行全国性的人财物力资源的动员，并能实现小共同体难以实现的社会公益功能。可以比小共同体更高效地抵抗北方少数民族的侵入，然而，这一结构的演化能力受到以下因素的限制：

首先，在这个大一统体制内部，由于大一统王朝统治者不再面对强大的外部敌手，他们可以不需迎合臣民的需要，也无须自我约束自己的贪欲。秦二世的享乐，汉武帝的穷兵黩武，明代矿税监对民间商人的残酷掠夺，均可以说明问题。

其次，在大一统的条件下，各地之间虽然存在

着差异性，但在中央集权政治“一道同风”的官僚体制制度下，不可能再次出现某一地区相对于其他地区的自由选择的区位优势。全国普遍推行的是同样的重农抑商政策，对商人的打压，从来不会受到另一地区的挑战，政府也不会为了留住人才而采取某种经济优惠政策。约束自己的行为，扩大自由，保护产权。

第三，郡县制帝国是通过“分”的精神，作为秩序的基础的，“分”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中的最核心概念。分的社会学功能在于，根据一个人在社会上承担的角色与功能，如君臣、父子、夫妇、兄弟、长幼，来确定人在社会上的高下地位，并根据地位的高下，来确定他所应该获得的稀缺资源，如权力、地位、财富、荣誉，这样，就可以有效地避免“无分之争，争则乱，乱则穷”的困境，避免同质社会内部无休止地对短缺资源的争夺。

在儒家看来，光靠人君的权威与外在的禁令还不足以使分成为社会成员自觉遵奉的准则，只有把分的规范经由礼仪化，符号化，通过礼、名与器的结合而形成的对等级秩序的敬重，才有有效地达到分的秩序。如果我们把握了分、礼、名、器、制、禁、官、君的有机关系，并进而把握了礼、名、器对于巩固“分”的秩序所发挥的功能，那么，整个中国文化的内在组织凝聚方式的秘密就呈现在我们面前。

这种以礼名分为基础的社会结合模式有什么特点？个性的自主性不能得到发展，因为个性是与礼的要求相矛盾与相冲突的。礼制压抑个性的发展，并把个性的张扬视为对结构稳定的威胁。集体意识抑制个性的发展。个人与共同体的选择，是在礼的规范支配下进行的。

这两种不同的结构如何影响了资本主义形成的可能性？从新制度主义角度来看，一种文化对新事物的适应，首先是一个分散化的试错过程。这种试错过程的作用就是应付我们的这种无知状态。因为人类对复杂事物的认识是有局限性的，个体中的差异，使人们在应对挑战时，可能存在着个性上的差异，创新与变异在个体中发生，然后，是一个自然

淘汰的过程。有些变异特别能适应新挑战，它就对其他个体起到示范作用，其他个体纷纷向它仿效。多数人接受了变异。成为共同准则。西方文明的结构特点是异质性、小规模、分散性、流动性、开放性、多元化，竞争性，中国是同质性、大一统，等级性、反竞争性。前一种结构具有通过小规模个体的自主选择与变异，来形成微观个体的试错机制，以及竞争个体之间存在的区位优势。后一种结构则需要一道同风，各安其分，达到等级秩序下的和谐统一。

从以上视角来看，西方文明的小规模社会的结构特点，虽然并没有产生统一帝国文明发展的规模效应，但却具有极大的通过微观试错形成宏观演化的机制与潜力。相反，儒家文明具有巨大的帝国体制，幅员广阔，人口众多，形成文明发展的规模效应。但这一文明需要强化同一性，来实现整体的稳定。在大一统、同质性、一道同风的思想与意识形态支配下，国家用统一的价值规则与稀缺资源的垄断，来约束社会精英，并限制了社会进步所需要的个人选择空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从新制度主义理论角度来分析，中国文明史实际上是一部通过压抑个性以实现宏观的大一统的稳定的文明的盛衰史。

这一结构比较也有助于解释日本封建制比中国中央集权制更容易通过接受西方挑战而走上现代化之途。这是因为日本藩国体制的封建社会，具有类似于西欧“小规模、多元性、竞争性、流动性”特点。日本的浪人与武士文化，起到的小规模个体试错机制的重要功能。日本明治维新，正是借助于这种结构特点得以成功的。这些特点导致日本传统社会具有更强的自我更新与演化能力。相反，中央集权制的儒家王朝，恰恰通过开放的人仕制度而导致社会成员的同质化，同质化的结果是使试错能力受到限制。儒家国家在适应环境挑战过程中，是作为单一的试错主体来适应环境的，国家意识形态强有力地制约了试错主体的选择路径。形成强烈的路径依赖性。在新制度主义视角下，这种结构比多元小规模试错主体，在应对环境挑战时的适应能力更为

低下。

中国的改革开放，使经济领域中的大一统的计划集权体制，逐渐转变为具有多元体制特点的市场经济体制，这种结构的小规模，多元性，自主性，

决策分散性，开放与流动性，使中国社会有了新的结构演化动力。个人与社会的自主性、个体与共同体的竞争力与微观试错机制得以激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改革具有文明史上的划时代意义。